



星用费外，一概存入国家银行，使国家银行有可能利用这些存款供应借款者的需要。此外，政府又掌握大量物资，进行全国性调剂，如以川米（四川大米）接济上海。因此，自1950年3月以后物资供求也得到平衡了。外汇收支也早已平衡了。有了这四种平衡，即财政收支平衡，货币出纳平衡，物资供求平衡和外汇收支平衡，1949—1954年全国各地物价很少变动，人民币信用之高，是旧中国历史上所未有……在这样巩固的基础上，人民币信用将日益增长，成为世界上最完美、最健全的货币之一。”马寅初这样断言是有依据的，1950年12月上海物价比1950年2月降低15%，且从6月起物价趋于平稳，宣告抗战爆发后连续12年的涨价潮告一段落，市民无不拍手称好。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与麦克法夸尔合编的《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》提到，20世纪50年代，中国国民收入积累率大多控制在年均24.2%左右的合理范围，保证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，“在上海，1957年与1952年相比，市民人均消费水平指数增长超过30%，而物价指数同期仅上涨9.5%，城市居民储蓄存款总额增长3倍多，仅此一点，共产党‘说到做到’的作风，让上海人心服口服”。

至于上海相对收缩的对外金融功能，则要从另一个维度思考。早在1949年初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，毛泽东就以“统制外贸”一词描绘未来国家进出口活动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中央政府对金融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管理，把上海的金融机构总行、总公司迁到北京，所有进出口总公司也设在北京。国家从南到北设立广州、上海、青岛、天津、大连等五大口岸，维系与世界

解放初期，各地煤炭运抵上海。



的贸易关系，它们都受北京总部领导。这种局面的形成，绝不是某个人的原因，而是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大搞封锁禁运、台湾蒋介石集团武力袭扰、社会主义大家庭单一市场等等因素叠加带来的合力，构成了其时的中国涉外贸易和金融的高度计划格局。有意思的是，上海外贸却变得更健康（相对于旧中国时代），作为过境地，山南海北的产品、商品继续从上海出入，而上海自身工业和科技实力也奠定了良好的出口基础，上海外贸因此保持了一个纪录——全国的六分之一，这种“幸福”足足持续了四分之一世纪。不仅如此，执行管理外汇任务的国有中国银行针对上海的特殊地位，专门在此保留庞大的金融服务机构，以满足贸易购汇结汇业务。相当长时间里，在上海外汇交易所，每天开市时，先由中国银行公布开盘价格，继而由交易员在交易所内根据外汇供求情况自由议价成交。国家本着“推广输出，管理进口，发展生产，繁荣经济”的基本原则，确定管理中外进出口对象，并把进出口货品分为准许、特许、禁止三项，出口必须结汇，进口必须领取进口许可证，除以外汇办法管理进出口贸易，更规定了可以易货贸易。这种安排，既适应了当时全力推进国家工业化的基本国情，同时也为上海未来金融大发展留出空间。

## 直面“汤因比效应”

1978年，当邓小平用那双有力的手拉开中国大门时，改革开放的春风让上海金融站到新的风口浪尖。为了发挥银行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，诸多专业银行相继恢复或从人民银行中分立出来，纷纷在上海设立机构，1986年，国务院决定重组交通银行，并把它从北京迁至上海，至此国内各大银行均在上海完成机构的设立。

生活告诉我们，当一种传统秩序消失之日，也正是这种秩序下的利益格局重塑之时。上海金融改革的市场压力，首先在上海外贸领域造成经典的“挑战—应战—再挑战—再应战”的汤因比效应。原上海文体进出口公司外销员倪智强记得，改革前，这家“外贸老字号”从不算细账，盈